

■知无不言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南山答案

——土地集中仅仅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城乡一体化实际上是城市化的体现,这期间避免不了土地的集中。然而,仅有土地集中,并不能促动城市化的进展。况且,不同机制与模式的土地集中,所产生的效果也相去甚远。那么,有效促进城乡一体化或者城市化进程的充分条件是什么?何种机制与模式的土地集中才最有效也最公正呢?

近日有机会去了趟已经名声在外的山东南山集团公司,在所见所感之中找到了答案。

站在位于胶东半岛龙口市的南山之巅,可以一览十公里外的浩瀚渤海。山脚下,1990年以前还是一个贫穷小村落,从纺织厂开始起步,今天已是一个包括铝业、能源、纺织服装、酿酒、旅游、教育、医疗、建筑等多个产业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公司,位居中国五百强之列。

真正引起我兴趣的,倒不是什么传奇故事,而是在南山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集工业、教育、旅游区、居住区、商业区于一体的典型集约化小城镇,格局科学合理,规划大气而实用。在第一期建设的城镇里,包括南山集团先后兼并的30余个自然村及其居民,共计4万余人。他们不仅成功地由农民转化为产业人员与城镇居民,而且进入了“小康生活”时代。

由此,南山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两点,工业化是城市化或者城乡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说是充分条件;工业化同样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集中的前提,而有效的土地集中模式必然是自发性质的,或者说本着市场化原则进行的,即南山人讲的“行政村兼并”是也。

设想,如果没有当年赖以起家的纺织业,哪来的资本积累、胆识与经验去发展服装、铝业、能源等产业呢?没有这些工业厂矿企业的资本积累,以及发展过程中所不断提出来的各种需求,又凭什么去创办教育、医疗、现代农业、酿酒以及旅游业呢?又哪来的资本去规划设计比大城市社区与居民住宅还要漂亮洁净的新型居民生活商业区呢?

然而,在城市化或者城乡一体化的推进热潮中,不少地方却忽略了这一原则与前提条件。在没有相当的工业化积累与远景规划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政府就一厢情愿地设计起“城乡一体化试验”的新型政绩工程来。运用行政手段,推行农村人口的聚集,片面地在住宅建筑上追求整齐划一。这样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不仅着实地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还大大增加了城市化应有进程的成本。

有的地方政府天真地以为,只要取消了传统城乡居民身份之别,统一称作“居民”,便步入所谓的“城乡一体化”了。尽管不能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没有触及到城市化的本质条件——工业化。

通过工业化积累的财力基础来推进城镇化建设,并非是南山之首创,中国也不乏农民靠自身力量推进村落转型的事例。然而,创业领头人在将自己居住的村子带富之后,又能依“兼并”手段,在自愿自发的基础上,将周边越来越多的村子予以集中,先后带入到工业化与城镇化浪潮中,达成“小康社会”的共同富裕,在我所知的范围内,南山应是一个首创。

南山人的“兼并”,是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时发生在产业领域的现象,因而也只有工业化推进与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南山集团,才可能利用这一现代产业集中机制,将自身的力量伸展到越来越多的村子。这一集中过程是一个生于农村兴于工业化的民营企业去兼并别的村落,没有政府直接参与的影子,没有行政手段,有的只是南山集团的吸引力,有的只是地方政府的背后支持。

正是先行走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村落与农民那有声有色的转型、富裕与进步,树立起了强大的榜样力量。它比任何级别的行政力量都要来得强大与有效。所以,发生在村落之间的这一大规模兼并,实际上是一个机制的巨大转变,其精髓就是自然、自由的市场化原则。

那些拟被兼并村子的农民看到了加入南山集团的巨大比较利益,才使南山集团成功兼并了越来越多的村子,也才使其能够利用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与土地——越来越丰厚,发展基础越来越稳固,发展潜力越来越大,也才使这一工业集团所带动的城镇化范围不断延展,城镇化的集约程度越来越细致。这种越来越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城镇化,是真正符合

■乱弹

为最困难任务准备最负责任肩膀

◎周洛华
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人

中国投资公司挂牌成立了。看中投公司的决策层名单,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么一支优秀的团队将管理着2000亿美元的资产,如果把公司的管理架构和决策流程明确地告诉大家,或许可以使关心中投公司的大众放心。

中国投资公司的高管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因为这个挑战实在太艰巨了。

全世界的资金都认定人民币要升值,美元要贬值,争相来中国寻找投资机会,而中投公司则要逆势出海,去海外寻找投资机会。这当然意味着中投公司要比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投资机构都要更聪明,因为他们纷纷抛弃美元资产的时候,找到有高回报可能的投资机会。我希望这项任务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碟中谍”(英文片名Mission Impossible直译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般来说,以中投公司这样的规模和背景,要么追求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投资,要么追求高回报,前者可以不必计较一时得失,后者则完全可以追求市场化运作。从中投公司管理者的表态来看,他们是以投资回报率来考核的。这无疑增加了公

■大英小语

英人中国观:问号代替了感叹号

◎李俊辰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

英国《卫报》前总编辑,现《卫报》专栏作家威尔·哈顿(Will Hutton)年初推出一本写中国的新书《凶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书中道出他所看见的中国未来发展危机,及提出他的解决方法。哈顿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客座教授,由于他数次接受该校的邀请演讲,因此对哈顿我并不陌生。去年秋天他曾在该校的演讲中发过类似评论。至今一些言语还余音环绕。

哈顿的见解,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一定很新鲜,但看看老外如何有系统地分析中国,总算是个参考,有个借鉴的作用。

曾为政治记者的哈顿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结论是,如果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拥抱西方价值,全盘西化。书中这么写:“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我现在更清楚经济与社会‘软’制度——教育、诚信与问责——之间的关系;它们对社会与个人发展同样重要……中国教晓我的,讽刺地正是我们所宣扬的西方价值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价值好好实践,那么‘凶兆’就会降临我们——及中国——身上……非西方社会批评我们伪善——中国常常是其中一个批评者……经

济渐强下的中国人自信自满,不断肯定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大有可为,原因部分是源自这种随处可见的对西方的批评。”

我无意过多评论这些论点,我想说的却是,在西方,尤其是英国,如今好像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辩证”,不再一味地感叹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甚至高喊所谓“中国威胁论”。现在似乎有更多的人开始另眼看待中国,不少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白领都认为中国这趟东方快车虽然高速前进,但是前进的车轮已发出了很多杂音。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存在不少隐忧等等。比如哈顿曾说,中国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来支撑的,而真正要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内有旺盛的消费需求,但老百姓大把花钱还缺乏安全感,要让他们放心花钱,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就需要政府去向富人收税,而富裕的中产阶层就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等等。

如此看待中国发展的不只是英国人哈顿。就在哈顿去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后不久,另一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黄亚星也来到该校作了关于“印度和中国发展模式”的报告,当时全场座无虚席。黄先生已

后开始海外投资。可怎么去海外投资,到底是个新考验。现在市场议论纷纭的正是中投公司的第一笔对外投资,以上市发行价的95折购买了10%的美国黑石公司的无投票权的股权,并承诺4年之内不流通。中国投资公司入股黑石之后,国内的报纸上开始盛传黑石在中国国内积极寻找投资对象。我们本来是想用掉一部分高额的外汇储备,才向海外投资,结果却是我们的投资对象用这些钱继续投入到中国,可能很快又转化成我国新的外汇储备。

我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普通纳税人,对中国投资公司有几点希望:首先,中投公司成立的背景是外债大量进入中国,导致国内流动性泛滥,央行堆积起了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把这些钱花出去,引导资金外流,抵消(而不是对冲)外汇流入,这似乎成为了我们这个长期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迅速组建中投公司的动机之一。我希望中投公司在运作过程中,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而不要仅仅从减轻央行外汇占款压力出发去考虑问题。

其次,并不是说集中了一批聪明人就能够组建起战无不胜的投资公司。要是那样的话,那由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不会垮台了。即便是最成功的财务投资者巴菲特,也给其所投资

的企业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投资人关系等方面出现积极的变化;也包括对其商业模式的潜在价值的提前认同。希望中投公司能够培养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不仅仅是以背靠国家庞大的外汇储备作为自身最大的资源。

再者,中投公司本身应该和央行有所区别,可以考虑安排做空美元的政策,以便和央行的多头美元形成一个对冲,这样可以缓解我国有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纵观我国大型国企在海外投资的几个失败例子,无论是国储局做空铜,还是中航油做空石油,都是进一步放大了央行已经持有的美元多头头寸。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安排相反的头寸,结局或许就完全不一样了。中投公司的投资应该考虑使国家承担更小的整体风险。

这些天来,我总想起在塔克商学院对门的工程学院的门口有一块大石头刻着的该院创始人撰写的一段格言:“为最困难的任务准备最负责任的肩膀”。我借用这句话来祝贺中投公司的开业,并祝愿他们一切顺利。我相信他们有这样的肩膀。他们创造的投资奇迹将使每一个老百姓受益,相应地,他们的投资损失最终也将由老百姓来承担。

因此,我衷心祝愿中国投资公司成为资本市场又一个巴菲特。

于“政绩工程”或“面子工程”对官僚晋级的台阶作用,基于各种官商勾结的投机力量的普遍化,基于诸如南山集团这样的来自农村又能走出农村的民营资本力量的缺乏,等等。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对政府官僚机制改革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过程,那么,现在可以着手的有效途径就应当是鼓励南山模式发展壮大,并能尽可能多地开花结果。

通常情况下,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就得称严重的通货膨胀了。以此为参照系,今年上半年的CPI指数达到了3.2%(7月和8月有连续提升趋势),似乎通货膨胀已经全面来临。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希冀将继续抬高的物价水平抑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毋庸争论的是,在CPI较大的增幅中,食品和能源两个项目的价格上涨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它表明,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还是一种结构性物价失衡现象,还很难就此得出有物价水平已经远远偏离可控范围的结论。

现在的关键词是,政府实施价格管制的手段有哪些?这些手段具有怎样的差异,它们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讲,如果这些基本问题弄不清楚的话,价格管制的行为不仅具有盲目性,甚至还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就笔者的理解,政府价格管制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与市场导向型价格管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这两者都有其不同的适用情况。通常,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主要是通过行政指示、长官命令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条文实现的强制性价格管制,其本质是政府直接干预价格水平或变化区间。主要见于三种情况,一是出于伦理、道德规范约束要求所实施的最低工资限制;二是维持特殊时期的经济社会稳定所实施的价格限制,如“非典”时期的药品价格限制,战争时期和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也在此之列;三是因产品的特殊性致使市场法则局部失效或完全失效所引起的价格管制,如外部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的产品等。

相对而言,市场导向型价格管制指政府部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在适度借助行政权力的条件下,通过经济杠杆对产品价格进行的引导性调节,其本质是政策型或制度型的价格管制。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在实践中,政府实施市场导向的价格管制现象比较多见,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那些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市场规律无法发挥作用或者强制运用市场规律将严重违背社会公平准则时,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就是最佳调节手段,它既可以弥补效率的缺失,也可以降低行为主体被市场损害利益的程度,并且,它还具有达成目标时滞短的优势。当市场运行效率较高,但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或不良发展趋势时,市场导向型价格管制就更适宜于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尽管这种管制手段的时效性可能比较长,但它却因为具有较强激励兼容特性,而不至于引起市场效率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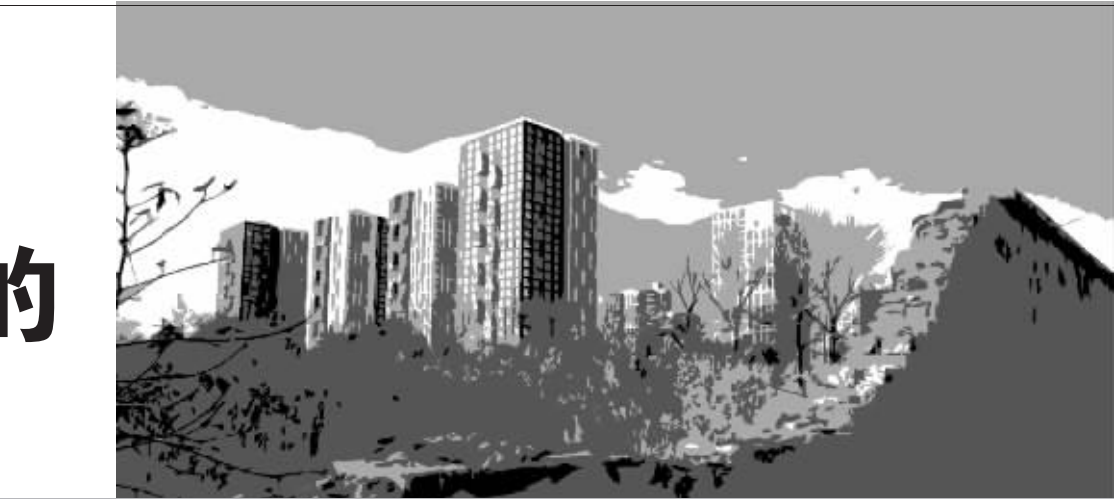
那么,面对粮价的日益上涨,我们究竟应该采取哪种价格管制手段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从粮价上涨的根源及其程度来寻找答案。根据已知情形,本轮粮价上涨的原因有四:经济增长驱动下的机械性增长;前几年粮食价格偏低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带动国内粮食及副食品价格上涨;粮食的替代性使用(使用范围)大规模增加引致的供给冲击下的价格增长。从增长幅度上看,今年上半年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6%,高出去年同期5.5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4%、蛋价上涨27.9%、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0.7%,其余商品价格有涨有落。结合这些数据和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当前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市场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总的物价上涨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二是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不低,不能排除产品间价格连锁反应的可能。第二个结论虽然预示了粮食价格上涨对未来发展水平的影响很可能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潜在的不稳定性因素,但第一个结论却警告我们要理性看待粮价上涨的效应,绝不能据此就武断地得出已经严重威胁到民生的判断。因此,是否采用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就必须做出慎重的思考。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改善民生,那么,计划限价可以使所有人的短期福利水平迅速改善,但它所带来的成本却要由市场经营主体来“埋单”,其本质是以扭曲市场机制来换取消费者的短期福利,而从长期看,扭曲的市场很难纠正过来,经济主体的福利将因为市场化改革无法深入推进而蒙受损失。换一个角度,如果设定的目标是希望尽快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性因素,那么,计划限价的实行也不能是由政府说了算,还需要听取相关专家、中介机构、市场主体等多方的意见;换句话说,即便要完全依靠行政力量介入市场运行,也要严格按照制度化的程序来操作,同时还要求严格遵循市场的规则并严守行政的边界。

当政府通过“有形之手”介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时,得时刻提醒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调节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信号。如果这一信号发生了偏离,只要没有超出可控的范围,如果不是由产品自身的特性(如公共品,存在外部性的产品)或制度扭曲(如房地产等)所致,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使用经济杠杆予以纠正。

接受采访的一位官员说,这类污染问题很普遍,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以牺牲环境和人们健康为代价的。这些学者和媒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描述是否准确和客观,不是我在这里探讨的话题。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西方,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在不断调整。过去曾经感叹中国的经济奇迹,甚至发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现在又开始津津乐道于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使我想起西方一新闻研究学者在总结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时的态度变化。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需要中国与苏联对抗时,美国媒体曾把中国人民描绘成勤劳善良和诚实的民族,比如某位美国客人退房,他粗心地把东西落在了房间,那么宾馆服务员会一直追赶你,直到把东西交到客人的手上。但到了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描述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某代表团成员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对代表团领队说,住在中国的宾馆,必须把东西随身携带,因为中国宾馆服务员可能个个都是国家安全机关派出来的。过去那个诚实善良的宾馆服务人员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已成历史云烟……

中国在变化,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也在不停地变。我好奇的是,再过几年,不知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长短集

效率边界制约价格管制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通常情况下,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就得称严重的通货膨胀了。以此为参照系,今年上半年的CPI指数达到了3.2%(7月和8月有连续提升趋势),似乎通货膨胀已经全面来临。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希冀将继续抬高的物价水平抑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毋庸争论的是,在CPI较大的增幅中,食品和能源两个项目的价格上涨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它表明,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还是一种结构性物价失衡现象,还很难就此得出有物价水平已经远远偏离可控范围的结论。

现在的关键词是,政府实施价格管制的手段有哪些?这些手段具有怎样的差异,它们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讲,如果这些基本问题弄不清楚的话,价格管制的行为不仅具有盲目性,甚至还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就笔者的理解,政府价格管制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与市场导向型价格管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这两者都有其不同的适用情况。通常,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主要是通过行政指示、长官命令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条文实现的强制性价格管制,其本质是政府直接干预价格水平或变化区间。主要见于三种情况,一是出于伦理、道德规范约束要求所实施的最低工资限制;二是维持特殊时期的经济社会稳定所实施的价格限制,如“非典”时期的药品价格限制,战争时期和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也在此之列;三是因产品的特殊性致使市场法则局部失效或完全失效所引起的价格管制,如外部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的产品等。

相对而言,市场导向型价格管制指政府部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在适度借助行政权力的条件下,通过经济杠杆对产品价格进行的引导性调节,其本质是政策型或制度型的价格管制。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在实践中,政府实施市场导向的价格管制现象比较多见,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那些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市场规律无法发挥作用或者强制运用市场规律将严重违背社会公平准则时,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就是最佳调节手段,它既可以弥补效率的缺失,也可以降低行为主体被市场损害利益的程度,并且,它还具有达成目标时滞短的优势。当市场运行效率较高,但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或不良发展趋势时,市场导向型价格管制就更适宜于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尽管这种管制手段的时效性可能比较长,但它却因为具有较强激励兼容特性,而不至于引起市场效率的缺失。

那么,面对粮价的日益上涨,我们究竟应该采取哪种价格管制手段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从粮价上涨的根源及其程度来寻找答案。根据已知情形,本轮粮价上涨的原因有四:经济增长驱动下的机械性增长;前几年粮食价格偏低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带动国内粮食及副食品价格上涨;粮食的替代性使用(使用范围)大规模增加引致的供给冲击下的价格增长。从增长幅度上看,今年上半年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6%,高出去年同期5.5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4%、蛋价上涨27.9%、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0.7%,其余商品价格有涨有落。结合这些数据和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当前粮食价格的上涨是市场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总的物价上涨程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二是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不低,不能排除产品间价格连锁反应的可能。第二个结论虽然预示了粮食价格上涨对未来发展水平的影响很可能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潜在的不稳定性因素,但第一个结论却警告我们要理性看待粮价上涨的效应,绝不能据此就武断地得出已经严重威胁到民生的判断。因此,是否采用指令导向型价格管制就必须做出慎重的思考。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改善民生,那么,计划限价可以使所有人的短期福利水平迅速改善,但它所带来的成本却要由市场经营主体来“埋单”,其本质是以扭曲市场机制来换取消费者的短期福利,而从长期看,扭曲的市场很难纠正过来,经济主体的福利将因为市场化改革无法深入推进而蒙受损失。换一个角度,如果设定的目标是希望尽快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性因素,那么,计划限价的实行也不能是由政府说了算,还需要听取相关专家、中介机构、市场主体等多方的意见;换句话说,即便要完全依靠行政力量介入市场运行,也要严格按照制度化的程序来操作,同时还要求严格遵循市场的规则并严守行政的边界。

当政府通过“有形之手”介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时,得时刻提醒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调节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信号。如果这一信号发生了偏离,只要没有超出可控的范围,如果不是由产品自身的特性(如公共品,存在外部性的产品)或制度扭曲(如房地产等)所致,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使用经济杠杆予以纠正。

接受采访的一位官员说,这类污染问题很普遍,主要是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以牺牲环境和人们健康为代价的。这些学者和媒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描述是否准确和客观,不是我在这里探讨的话题。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西方,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在不断调整。过去曾经感叹中国的经济奇迹,甚至发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现在又开始津津乐道于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使我想起西方一新闻研究学者在总结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时的态度变化。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需要中国与苏联对抗时,美国媒体曾把中国人民描绘成勤劳善良和诚实的民族,比如某位美国客人退房,他粗心地把东西落在了房间,那么宾馆服务员会一直追赶你,直到把东西交到客人的手上。但到了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描述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某代表团成员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对代表团领队说,住在中国的宾馆,必须把东西随身携带,因为中国宾馆服务员可能个个都是国家安全机关派出来的。过去那个诚实善良的宾馆服务人员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已成历史云烟……

中国在变化,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也在不停地变。我好奇的是,再过几年,不知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形象?